

文史知識

博而返约 学而能思——治学漫谈

吴调公

周邦彦和他被错解了的词

吴世昌

略谈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

黄烈

中国历代官制讲座(三十一)金代职官

周清澍

「八仙」的来历

龙士靖

清代诗歌与清诗研究现状

周秦



1986



WENSHI ZHISHI



医药学院610 2 01478407

文史知识

1986年第11期

(总第65期)

·治学之道·博而返约 学而能思——治学漫谈 吴调公 3

·文学史百题·周邦彦和他被错解的词 吴世昌 8

·历史百题·略谈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 黄烈 16

·怎样读·大唐创业 功当属谁——读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 李季平 24

诗 文 欣 赏	漫谈“诗无达诂”(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二十五)	蒋凡	32
	汉乐府诗《江南》赏析	王思宇	38
	秋浦歌(之十五)赏析	乔向钟	40
	借眼前之景 抒不尽之情——秦观《踏莎行》简析	陈祖美	42

·文史书目答问·《世本》及其辑本 郑超 45

·文史工具书介绍·怎样使用《中西回史日历》 张何清 49

文化 史 知识	说“乡党”	宋昌斌	52
	桃木漫说	赵文心	56
	中国木偶艺术的源流	庄晏成 许在全 张敬尊	60

·中国历代官制讲座(连载三十一)·
金代职官 周清澍 63

《明史稿》旧案重提 牟小东 68

·文史信息·玄学思潮怎样代替了经学思潮(73) 《九歌》解谜
(73)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(74)

人物春秋	独树一帜的宋玉	袁 梅	75
	孔门弟子(之五)——宰予和樊须	曹道衡	80
	两汉经学和郑康成	李建国	85
	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	李富华	90
书籍形成的过程——略谈梵夹本的产生			周绍良 95
• 书画欣赏 • 绮丽媚好的薛稷书风			张 敏 99
成语	如坐针毡	瞿常春	102
典故	虎生三子 必有一彪	柯艾会	103
• 语言知识 • 释尸			龚维英 104
青年园地	谈沈约对《文心雕龙》的称赏	汪涌豪	106
	其事核而实 其刺允而当 ——对陈寅恪关于白居易《蛮子朝》一诗笺证的异议	龙凤祥	110
• 俗语佛源(一) • 天花乱坠 一尘不染 世界 一丝不挂 三生有幸 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 113			
• 文史古迹 • “濠濮涧”的妙趣 ——北海“濠濮涧”园林艺术欣赏			王 毅 115
• 文史信箱 • “八仙”的来历			龙士靖 119
• 文史研究动态 • 清代诗歌与清诗研究现状			周 秦 125
• 补白 9 则 • 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(7) 文章有不当为者 五(23) 喝墨水(37) 读书须作相别计 (39) 黄允自败名誉(72) 集大成(84) 当局者清(89) 公孙龙收弟子(101) 学 者之病(124)			
薛稷《信行禅师碑》(封二)		北海“濠濮涧”(封三)	

博而返约 学而能思

——治学漫谈

吴调公



吴调公，江苏镇江人，1914年生。现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理事，江苏美学学会会长。主要著作有《海市集》、《李商隐研究》、《古代文论今探》、《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》等。

刚写下这一个题目，我不由想起清初著名文学理论家叶燮在《已畦集》中谈起的一段话。他说《原诗》的写作得力于冥思力索的不少。这也就是他自己说的“探其趣而究其归”。换句话说，他这部伟大的诗学力作，里面有不少的精辟见解，是他从长期涵茹的古籍精华的旨趣中经过穷源溯流探索而得的。因为当时他手头没有更多的书可供查检，由于兵戈扰攘和社会动乱，家里很多藏书都已经散失了。可是他过去却读了很多书，而且深有所得，因而他能够吸收那些蓄之已久的多方面的营养，作为反思的材料。从浩瀚知识中汲取精华，感觉其“趣”，可以说是由博返约；对诗歌具体现象进行探究，明确诗的源原本本，可以说亦学亦思。他长期积累的知识出自多方，而后来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精思力索，正说明他善于熔铸所学。

一般说来，人们在青年时代爱好总是多方面的。但我认为这不是坏事。兴趣广泛，杂学旁搜，万花筒般的生活画卷五采缤纷，探求宇宙、人生规律的精思妙论，历史长河的见证，殊方异域的地志图经，……大可开拓人们的视野，在丰富人们知识的同时引导人们的思

考，提高人们的思辨能力。尽管一时认识不全面，辨识力不高，更谈不上系统化，但只要一旦得到正确方法的指导，从多歧的道路中总结教训，杂乱无章的局面是可以改观的。这时，过去获得的多方面的知识就可以经过筛选，改造，取精去糟，纳入科学的轨道，从而逐步升华为宝贵的知识和卓越的见解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喜欢东顾西盼，学的很庞杂。爱语体文，也爱写点古散文和旧诗词；爱哲学家的沉思，也向往于古典文学研究，特别是古代诗论研究。学步苏、黄二家的书法，也画点中国山水画，还把不少韶光泡在古代画史和画论之中。大学读书时，开始写小说了，又搞点晚唐诗研究，特别是李商隐研究。毕业之初，在中学教书，除了写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试笔以外，又神往于尼采和泰纳。

这种贾宝玉式的“杂学旁搜”耗费了我不少精力，系统化不够，扎根不深，但却也有一个好处：多少开拓了思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“杂学旁搜”原不等于“博学”。“杂学旁搜”是多而庞杂，而博学则是大而精深，以“一”贯“多”，既有全局，又有体系，正是《庄子·天下》篇所说的能“观于远近”。

认识到这一个关键，我不能忘记乡先辈史学家柳翼谋（诒征）先生给我的教诲。芦沟桥事变那一年冬天，我们全家和柳老一家合包了一条船移家苏北兴化。在作为国学图书馆部分临时书库的一个叫西仓的古老粮仓中，我得以时亲警欬。柳老是渊博的史学家。他曾经一再强调“博”与“精”的互为作用。因为当时我酷喜写诗、读诗，柳老特为我指出：首先要把历代名诗略读一番，对它们的流变承传，胸有成竹，然后再选自己兴趣较浓的一家、一派，或者与自己诗风较近的某些作品反复诵读，着意揣摩。他说：“历代诗人，岂有坐井观天？或为哲人，或为通材，或为饱经沧桑之士。他们的钟灵毓秀，含英咀华，说来都是百花酿蜜啊！为诗而诗，三家村的诗人，那又算什么呢？”

读诗、写诗有这一个博而能约的问题。扩而大之，一切人文科学的研究也无不如此。孔子的所谓博而返约，作为“今用”，是否可以从这两层意思理解：一种是当你熟悉和掌握了各种交叉学科、边缘学科的血肉联系后，在综合研究和宏观处理的基础上，把研究对象集中到

一个焦点之上，经过沉思培养，从而找到规律，得出结论。这可以说融各科之“博”，成为一种新知的“约”。另一种则是虽说没有运用辽阔的视角，进行宏观处理，但由于对某一学科钻研精深，掌握了它的多种侧面和多种层次的内在联系，对全局了然于心，其结果就能分清主次，辨明体系，化繁为简，突出思想核心。表面看来，经过提炼的知识好象只是为数不多的东西，即所谓“约”，但它们却千丝万缕地、萦回交错地通向了“博”；或者说，这种寓“多”于“一”的“约”，确乎是万斛琼浆浇灌成的奇葩。一般说来，前一种“博而返约”，显示知识之广，偏于宏观；后一种“博而返约”，显示知识之深，偏于微观。当然，深和广是密切结合、相因为用的。要达到这一种境界，我自己惭愧还有着不少距离。不过，具体而微地说来，回顾前尘，也不无有一点朦胧的体验。譬如，五十年代时，我写过一篇谈意境的文章，旁征博引，枝枝蔓蔓，恍恍惚惚，自己的主张并没有能突出。直到三十年后，这种迷惑才算初步消除。原来在这三十年中，我比较系统地“博”了一下。我教了好一阵马列文论、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论，特别是重温了美学，我渐渐地找到了贯穿着浩瀚资料的审美主客体的一根思想线索，初步把握了作为文学完整体系的四要素——现实、作品、作家、读者，这一来思绪就比较清晰了。于是我在1983年重新又写了一篇谈关于古代文论的意境问题的文章。文中突出这么一个核心：境中有人，境外有味。当然，我不敢说这一种“约”正确无误，但较之过去的冗赘烦琐、破碎支离的阐述，我似乎感到心明眼亮一些了。如果相对说来，我初步得由博返约之乐。之所以跨进一步的原因，决非限于对诗论一个方面的摸索。笼贯着“意境”探求的，有美学的弥纶，古今诗论的启迪，针对不同类型的诗作中意境的比较，诗人思维方式以至于民族思维方式的对照，对庄子以至玄学、佛学中有关“言”“意”的、涉及到批评史和哲学史的考察。如此等等。举个不恰当的比方：打起仗来，要千军万马，也要一个统帅。千军万马是“博”，一个统帅是“约”。

“博而返约”并不是一说就“返”。“返”字的背后可包含着无限的艰苦的实践过程呢。这正因为，纷纭繁复的知识材料有待提炼。知识的

各个领域间，相互关系究竟如何？哪些为主，哪些为次？从它们的复杂关系中找出了什么样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？只有对这些一系列问题作出正确处理，我们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推理和判断，既了然于浩如烟海的东西，而又举重若轻地掌握高屋建瓴式的东西。多乎哉？不多也。化“多”而为“不多”，但“不多”却又不同于贫乏、浅薄。“化”的功夫实际也就是“返约”的功夫，把资料化分化合的思辨功夫。

孔老夫子早就注意学和思的并用了。他曾经说过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他所谓“学”，指占有知识；所谓“思”指思考问题、分析问题。一个人如果不占有资料，光是一味玄想，结果必然流于空洞，不切实际；相反地只是注意资料积累，却不去消化、分析，进行独立思考，其结果也只有成为死读书、读死书、读书死，落入茫茫然而无所适从的地步。

思辨能力好象刀刃，愈磨愈锋利；相反地如果长期不用，必然生锈。然而由于磨炼的方式不同，其效果也就不同。写点札记，积累点“思考卡片”，未尝不是磨炼，也未尝不能提高思辨能力，不过，总没有制作论文这一种难度大的磨炼，能得到更好的效果。论文制作需要艰苦、复杂的思维，碰到的矛盾当然比写札记要多些，但经过深思力索的分析，解决矛盾以后，思辨能力将会得到更为显著的提高。当然，这并不等于说为了提高思辨能力，就非得大家都来写论文不可。我的意思只是说要敢于面向复杂的问题，敢于承受压力，本着精益求精的思想动力去多想多练。这正因为，多想多练，不是勉强可以做到的，有个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问题。思考一个命题，初步得出结论了，文章好象也写出来了，可是搁在抽屉里几天后再取出一看，思前想后，往往会发现过去想得并不周到，并不成熟。孔子谈到写文章的过程，曾有所谓“草创”、“讨论”、“修饰”、“润色”一系列过程，这恰好说明不能离开一系列思考，离开一再磨炼。思考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，有个解决矛盾的过程，有个不断提高的过程。

为了学思并用，我们要注意虚实并举。知识材料占有得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在掌握事物全面的基础上，多方面地、深刻地分析和综合材料，从而辨别其真伪，抽象出事物的本质规律，得出正确结论；而与

此同时，一个研究者因为运用某些特定的思维方式，次数多了，逐步定向、定型了，却又会慢慢形成他的特定学风和思想方法。这种来自实践的思维刀刃的磨炼，作为卓越的识见说来，威力极大，就好比“火眼金睛”，无所不见。它能在纷纭资料中发现内在联系，拎出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，恰如庄子所说的“以无厚入有间”，深入到“肯綮”之处，让原来湮没的、零散的、表面看来好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一些资料，重新恢复其生命，抖去一切掩盖着历史真相的灰尘，从新角度提出问题，发人深省。比如说，两种材料分明大体相同，但由于被两个研究者分别掌握，他们的思辨水平有高低，运用材料的方法迥然有异，因而研究的所得，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了。

“习于深思”很重要，但也要“善于深思”。“善于深思”的人就是能在充分占有前人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探索从而创新的人，也就是“博而能约”的人。唯其材料的占有能广，针对材料而进行的思考也才能深。什么叫深度？我看这就是融会贯通，能统帅自由的知识王国。朱熹说：“贯通，是无所不通。”无所不通是了然于知识的内在联系和核心所在，也就是所谓“约”了。要达到这一个如水逢源的境界，真是谈何容易！虽不能至，可我却愿为之而努力企求不已。

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

清康熙时，有“天下第一清官”之称的张清恪以政绩优异擢升为督抚，门生故吏、至亲好友闻讯后，纷纷携礼来见。张清恪依照“常规”，不纳分毫，为了杜绝纷至沓来的送礼人，他写了《禁止馈送檄》，高悬堂上，其文曰：

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，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，廉耻实伤，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？

寥寥数语，鞭挞了纳贿受礼的不义之举，表明了张清恪重品节、轻钱财，忠正不贪的高尚美德。——据《清朝野史大观·清人轶事》

（茂钦）

周邦彦和他被错解的词

吴世昌

周邦彦(1057—1121)字美成,晚号清真居士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他是北宋晚年的重要作家,诗、词、文、赋无所不擅,但在他生时即为他的词名所掩,其文、其诗,多零落不传,唯有年轻时所献《汴都赋》,为当时所称。《宋史》说他少年时“疏隽少检”,不为州里推重,(谓其生活放浪,不守礼节)而博涉百家之书。

元丰初,周邦彦到汴京,元丰六年(1084)献《汴都赋》,长七千字,神宗(赵顼)见而异之,召他到政事堂,命李清臣在迓英阁朗诵。赋中多古文奇字,清臣多不认得,只好读其偏旁。这是一篇摹仿汉代《两都》、《二京》的大赋,其规模也像汉赋。赋中用假设的人物“发微子”和“衍流先生”的对话来逐步开展对于汴都的描写与颂扬,其间也表示赞许王安石的新政。这和他后来的宦途坎坷很有关系。当他献赋之举传播之后,名动天下,即自太学诸生升任太学正。但以后久不迁升,而出任地方官:先任庐州(今安徽合肥)教授,后任溧水(今属江苏)知县。哲宗(赵煦)即位后调回汴京,哲宗命他再诵《汴都赋》,以后一直做京官:历任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、考功员外郎、卫尉、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。并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(今山西永济),知顺昌府(今安徽阜阳)。改知隆德府(今山西长治),迁官明州(今浙江宁波),再度调回汴京,拜为秘书监,进徽猷阁待制,直到徽宗(赵佶)时代提举大晟府(中央音乐院)。后来又出知顺昌府,迁处州(今浙江丽水)。

周邦彦的文集有南宋楼钥编的《清真先生文集》二十四卷,但元人编的《宋史·艺文志》集类所著录《清真居士集》只有十一卷。宋人有见其文者,陈师道说:“美成笺奏、杂著俱善,惜为词掩。”(《古今词话》)张端义说:“美成以词行,当时皆称之。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。惜以词掩其文也。”(《贵耳集》下)陈郁说:“(美成诗)自经史中流出。当

时以诗名家如晁(补之)张(耒)皆自叹以为不及。”(《藏一话腴》)周邦彦最初成名之作是《汴都赋》，楼钥的《清真先生文集序》中说他“由诸生擢为学官，声名一日震耀海内”。又说：“未几，神宗上宾，公亦低徊不自表襮。哲宗始置之文馆，徽宗又列之郎曹，皆以受知先帝之故，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”。这篇《汴都赋》因为收在《皇朝文鉴》之中，流传至今。他的别的文章如《操缦录》五卷，《清真杂著》三卷，皆已不传。

周邦彦的诗似乎在元代即已散佚。清初厉鹗等因编《宋诗纪事》，辑得其佚诗六首。后丁立中得六首，王国维得断句诗二首。近人罗忼烈复从《永乐大典》等书，多方搜辑，共得古近体诗三十四首。其中如咏战马《天赐白》(七古)、咏古烈士《过羊角哀左伯桃墓》(五古)，及其它古体诗，风骨凛然，绝无绮罗香泽之气，知宋代文人颇严诗词之别，不在闺房作《生民》《清庙》之诗，悬“杏坛讲学”之图。但这也并不证明这些文人不关心国家大事、民生疾苦。近人论词，有的以作品中有否反映当时社会情况为优劣标准，倒是证明这些批评家自己不知道某一时代的社会风尚。须知，宋人在诗中写景、叙事、说理、论道，就是不谈情说爱，而在词中，则赞美女性，诉相思，叙离恨。宋人一般不在词中反映社会问题，直到南宋，才在词中谈论国家大事。因此，象周邦彦这样一位言情圣手，在他的诗中绝对看不到他在词中所表达的情调与观感，这就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一般的风尚。

周邦彦在宋代“以乐府独步，学士、贵人、市侩、伎女皆知其词为可爱”。当时歌女以能唱周词而自增身价。张玉田在南宋末年(去周已近二百年)遇见杭妓沈梅娇、车秀卿犹能唱周词，可见其社会影响。这与周邦彦妙解音律相关。周邦彦的歌词声音谐美，顺口悦耳，非其它生硬俗滥的作品可比。他的堂名“顾曲”，即用三国时周瑜的典故。周瑜精通音乐，当时流传一句成语：“曲有误，周郎顾。”以“顾曲”名堂，可见其对音乐造诣的自负。

作为文学作品，周邦彦的词在宋代作家之中的地位，可从下列事实观之：

(一)在当时他的作品已有好几个版本，流传至今，有人统计，有十二个版本。宋词中一人的版本从无如此之多。

(二)他的词集在宋代即有两个注本：刘肃和陈元龙注本。

(三)另外有三位词人把他的词几乎全部写了和词（即照周词的韵再作一首）^①。这在中国词史上也是空前的。

从词学的观点来看周邦彦歌词创作的历史背景，可以说，那也是词史上空前的一个黄金时代。

北宋初期的词是《花间》与《尊前》的继续，它比《花间》的纯粹谈情和描绘妇女生活有点不同之处，是更多地继承了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哀怨之情。因此，宋初的大词人如晏殊、欧阳修等虽然过着富贵的大臣生活，而其作品中却孕育着无名的凄惻之感。这种人生中固有的盛衰生灭之感，人世的荣华富贵也无法逃避或改变。于是按照自古以来文人们的老办法：借酒消愁。有酒有歌，他们的词就是酒席上的歌。这些歌大都是小令。《珠玉词》、《六一词》都是以小令为主，可以想见它们的作者的风致。

《花间集》的传统在周邦彦的时代虽然还有影响，但已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作家即柳永、张先诸人。在张先（990—1078）这位长寿的作家的集子中，已开始引进大量的慢词，但小令还是主导的作品。在柳永的集子中则慢词大大超过小令。谈情说爱，离愁别恨的话头虽然永远是诗人的题材，但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二集以及宋初诸家也就说的差不多了。柳永、张先便分笔写江山之胜、游宦之情，真能双管齐下。他们在传统的小令以外，又创造了许多慢词，但并不废弃《花间》旧业。摆在周邦彦面前的，有宜于写情的《花间》小令和擅长绘景的新兴慢词。风靡海内的是柳永的新歌，连名满天下的苏轼也甚是羡慕“柳七郎风味”（《与鲜于子骏书》）。但柳永的作品虽然音调谐和、辞意明畅，却有点美中不足之处，即就内容而论，其谈情作品不脱《花间》旧习，而乏《花间》之精致。写景抒情者又多平铺直叙，无回环曲折、波澜起伏之势。换句话说，不能融情入景，就景抒情。情景并列如单页画幅，未能输情于景，情景交融，使得万象皆活。推其原故，盖因情景二者之间无“事”可以联系。救之之道，即在抒情写景之际，渗入一个第三因素，即述事。必有故事，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，

^① 三家和词的作者是：陈允平、方千里、杨泽民。

所抒之情有其来源。使这三者重新配合，造成另一境界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。但如果三者之中缺一，即难造成境界；若不能造成此境界，则其郁勃之气，未能藉其作品以抒写，即不能得到美学上最高之满足。周邦彦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北宋盛世，面对着旧的《花间》妙曲，新的柳、张慢词，既有无限的才情，想有所发挥，又想如何达到“二难并”。周邦彦看来所缺者唯有在情景之外，渗入故事：使无生者变为有生，有生者另有新境。这种手段，后来周济称之为“钩勒”。他说：“清真愈钩勒愈浑厚。”他所谓“钩勒”，即述事：“以事为钩，勒住前情后景，则新境界自然涌现。既涌现矣，再加钩勒，则眉妩毕露，毫发可见。故曰‘愈钩勒愈浑厚’。此事此境，可以凭艺术重现者以此。周邦彦最识此理，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以写景抒情的方法叙述故事。由于述事，有时不得不重现当时对话；因此，不但使境界重现，而且使气氛重现。《少年游》（“并刀如水”）一曲是最好的说明。试想在寥寥五十一字中，不但写故事，使当时境界重现，而且写对话，使读者如见词中人，能闻词中人语，此境界并非一般写景抒情所能创造。他集中的另外一首《少年游》（“朝云漠漠散轻丝”）写得更妙。一首小令写两个故事，中间只用“而今丽日明金屋”一句话中“而今”二字联系起来，使前后两个故事——亦即两种境界作为比较，重新追忆第一个故事中的情调。这正体现了周词“钩勒”的高超造诣。

但是，《清真集》中许多作品有故事结构，如果不先清理出来，弄清其来龙去脉，是不容易读懂的。前人由于未曾看懂作者的原意，对于周邦彦词颇多错解。

我们说，周邦彦除了善于在词中溶情入景以外，又善于引用“第三因素”——故事，来钩勒情景，使其所创造的境界更为真实可信。但这并不是说，当时或后人围绕这些作品所编撰的“词话”或“本事”都是真的。宋代有些文人喜欢在笔记中替名家的作品编造“本事”，表示他们是“消息灵通人士”，“熟悉词坛掌故”。某些大家如柳（永）、周（邦彦）、苏（轼）、辛（弃疾）诸人的作品，尤其不免。仍以周的《少年游》为例。因为它写的生活情味特别浓，故事特别真实，最后又记录了殷勤留客的情话：“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这样幽美的词

境，热情的关切，对于“词话”作者的引诱力实在太大了，不能不就此添些背景来陪衬，因此，各种各样的“本事”也就出来了。

“本事”的编造者深知读者心理：总希望在读了一首好词之后，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此词的情节故事。于是，挑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，说出来你知我知，容易为人接受。其实他只是要为自己编造的故事作广告，硬要拉名人名作来为他服务。粗心的读者只要看“本事”有趣，不但受了他骗，还不知不觉为他做义务宣传员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“词话”的编造者往往先把一首名作中主人公假定为作者或别的什么人，然后为这首词布置“背景”，再把作者拉来作“人证”，作品本身作物证。你若不信，“有诗为证”。“词话”的编造者把本来真实的词，当作证据，为他所伪造的故事背景作证。有时，因为所捏造的故事太长，一首词的内容不够敷衍，还把别的词也招来为他服务。例如，周邦彦《少年游》的故事本来只写情人晚会，与政治无关，也不必牵涉别的作品，但南宋末年的文人张端义在《贵耳集》中却将之与《兰陵王》捏合在一起，编造了一个有声有色、头头是道的“本事”。

道君（宋徽宗赵佶）幸李师师家，偶周邦彦在焉。知道君至，遂匿于床下。道君自携新橙一棵（颖）云：“江南初进来。”遂与李师师谑语。邦彦悉闻之，隐括成《少年游》^①云：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……。”后云^②：“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李师师因歌此调，道君问：“谁作？”李师师奏云：“周邦彦词。”道君大怒。坐朝谕蔡京云：“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，闻课额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案发来？”蔡京罔知所以。奏云：“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，续得复奏。”京尹至，蔡京以御前圣旨谕之。京尹云：“惟周邦彦课额增羨。”蔡云：“上意如此，只得迁就将上。”得旨：周邦彦职事废弛，可日下押出国门。

隔一、二日^③，道君复幸李师师家，不见李师师。问其家，知送周监税。道君方以邦彦出国（国都）为喜。既至不遇，坐久至更

① 当场“隐括”，从床底下塞给李师师歌唱？

② 中间略去的部分如下：“锦幄初温，兽烟不断，相对坐调笙，低声问：‘向谁行宿？’”

③ 《浩然斋雅谈》作“越一日”。

初，李始归，愁眉泪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大怒云：“尔往那里去？”李奏：“臣妾万死。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，致一杯相别，不知官家来。”道君问：“曾有词否？”李奏：“有《兰陵王》词。”今“柳阴直”者是也。道君云：“唱一遍看。”李奏云：“容臣妾奉一杯，歌此词为官家寿。”曲终，道君大喜。复召为大晟乐正。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（着重点为引者所加）……。

王国维在《清真先生遗事》中指出：“此条所言尤失实。”他的证据是：

（1）周邦彦没有做过“开封府监税”；（2）宋代没有“大晟府乐正”、“大晟乐府待制”这两个官职；（3）据《宋史·曹辅传》，徽宗微行“乘小轿子，随从数人”，则“马滑霜浓”之语即不适用于他身上。这几条证据当然是过硬的。但我们即使不查核《宋史》，即使不问周邦彦是否做过监税、乐正之官，单就这两首词的内容而论，也可看出张端义所编故事完全是靠不住的。这里，我们不妨先比较两首词的内容。这是两件独立的艺术品，彼此各不相涉。如果说，《少年游》是一篇短得无法再短的短篇小说，写的是冬夜留客之景，那么，《兰陵王》则是追忆春日分别的情景；二词各自独立，并无故事情节联系，何必为了伪造“本事”，把他们捏合在一起？《少年游》上文已引，这里不妨把《兰陵王》录下，看看是否与《少年游》的事迹发生在同一时期。词曰：

柳阴直，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登临望故国，谁识京华倦客。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闲寻旧踪迹：又酒趁哀弦，灯照离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回头迢递便数驿，望人在天北。

凄恻。恨堆积。渐别浦萦徊，津堠岑寂。斜阳冉冉春无极。念月榭携手，露桥闻笛。沉思前事，似梦里泪暗滴。

我们来看：《少年游》事在冬夜，“隔一、二日”，恼羞成怒的徽宗捏造一项罪名，把它的作者周邦彦“押出国门”。李师师这时到城外送周时，怎么已经是“梨花榆火催寒食”，①“斜阳冉冉春无极”的春天？伪造“本事”的人连词中时令都没有弄清楚，可见对两首词的内容并不理

① 古人以清明前一二日禁火，谓之“寒食”，即今四月四日。

解，只是瞎猜，以为《兰陵王》词中送客即是李师师送周邦彦，殊不知周邦彦在《兰陵王》中所咏者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因为《兰陵王》词的构思比较复杂，用笔也灵活，所以过去的词学家对此也不甚了然。虽然各家选周词者多不遗此篇，但解释往往语焉不详，含糊了之。其实这首词如仔细分析，也不难懂。这首词分为三片(段)，即所谓“双拽头”。第一片只是泛论古今来隋堤上折柳送客之众，只是晏小山所谓“世间离恨何年罢”的感慨，并非有所特指。周济谓“客中送客”^①，盖泥于“谁识京华倦客”一句而言之，殊不知“长条千尺”，非一人一朝所折，而折之者又岂尽是“客中送客”之人？第二片写实景，比较曲折，需要用些想象才能钩画出当时的图景，补足其省略部分。其中，“闲寻旧踪迹”一句，读者只要问：什么是“旧踪迹”？它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要去寻？寻者是谁？我们假定他是作者自己，再假定“旧踪迹”即是上片所谓“长亭路”上的行馆。但他自己如果是送行者，他将和行客诉说离情别意，哪有“闲”功夫去“寻”“旧踪迹”？这里，着一“闲”字，说明被送之客已走，故闲得无聊，非在情话缠绵、难解难分之际。那么，他寻到了“旧踪迹”，又见了些什么呢？是“酒趁哀弦，灯照离席”，乃一个未散的“离会”^②。这种会也即是自古以来所谓“祖道之会”。一方面是亲友们依恋不舍的诉说离恨别愁，另一方面又在“祖道”(祭道路之神，祈求水陆平安)对天地酌酒，祭品即作为别宴的酒饌。因此，这种会，也称为“离会”。第二片接着点明时令，说明是清明前一日。而“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”，作者则突然改变了视点，从船中写景，又抱怨船开得太快：“回头迢递便数驿！”他是什么时候离岸上船的？被送的行客又在哪儿？他补了一句，作为二片的歇拍：“望人在天北。”谁“望人”？“在天北”者是行客还是送客？等等。第二片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所不解的。周济说：“‘愁’字代行者设想。”下文他就老实说：“以下不辨是情是景，但见烟霭苍茫。‘望’字、‘念’字尤幻。”然而“离会”未散，可以听到“哀弦”，望见灯火，怎么行客又已经在“一箭风快”的船中，望“天北”送客之人呢？如果行客已经上

① 《宋四家词选》本词评语。

② 参看清真《夜飞鹊》：“相将散离会。”

船，则“离会”已散，何以还有“哀弦”与灯火；若“离会”未散，则船中又是何人？等等。这些问题，周济并不曾弄明白。今按：“闲寻”以下十四字的全首词结构中的枢纽，一“愁”字又是十四字的枢纽。行客并未下船，故“愁”字不是代行者设想。“愁”字乃作者自言预愁或预想，乃从李商隐《曲江》“迎忧急鼓疏钟断，分隔休灯灭烛时”的“迎忧”中化出。古时送客常常陪伴客人行走一段去程，然后送者归家。清真另有一首《夜飞鹊》也说明这种情况。其下片云：“迢递，路回清野，人语渐无闻，空带愁归。何意重经前地，……但徘徊班草，欷歔酹酒，望极天西。”这一段叙述与《兰陵王》中片收束时说“望人在天北”，笔法相似。但《夜飞鹊》是实写，《兰陵王》中片“一箭风快”一联是设想，是预“愁”。“回头……数驿”即“相去日以远”之意，也是预“愁”。作者自己设想在送走了客之后，于回程的船中一个人孤寂地归去。但《兰陵王》比《夜飞鹊》多出了第三片。这一片上接第二片所预想的船行之速，下接“别浦萦徊，津埃岑寂”，使二三两片看来好象浑然一体。周济因为先假定“愁”字代行者设想，所以下文便无法解释。我以为，船中所见之景，并非代行者设想，仍是作者预愁别后回程中所必经的“凄恻”情景。于是，在孤寂的回程船中，又回忆起从前和情人“月榭携手、露桥闻笛”的韵事，觉得往后只有在梦中相见了。

由以上的分析，可见这首《兰陵王》是一首独立的词章，与《少年游》毫不相干，也不可能是写了《少年游》之后不久的作品。说明：有关这两首的所谓“本事”，完全是伪造的。前人对于宋人有关宋词的笔记小说，早已有过怀疑，但未提出具体的证据，以上的分析，可证实前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因此，研究周邦彦及其词，必须从作品的具体内容入手，弄清其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行动等各种关系，才不至在“烟霭苍茫”中迷失方向。

正值此文付印之际，惊悉吴世昌先生于八月三十一日逝世，噩耗传来，全室震惊。先生生前对《文史知识》多方支持，逝世前十三天还于《人民日报》撰文热情评论我刊所编“先秦专号”；此后不久先生又交来本文校样，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。不想竟尔永逝，睹文思人，哀如之何！特此附记，以抒思念之情。本刊编辑部 86 年 9 月 25 日

略谈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

黄烈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各族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。民族关系有时处在相对平稳的状态，有时又会发生激烈的动荡。我国历史上曾有四次民族大激荡的时期，这就是春秋时期、魏晋南北朝时期、宋辽金元时期和清代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最复杂，动荡最激烈，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时期。各族先后进入内地，纷纷建立政权，彼此取代，战争连绵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，但最后却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融合。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匈奴、东羌、氐、巴、鲜卑、羯及其他许多杂胡，都是在这个时期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，绝大部分都与汉族融为一体隋唐所出现的统一、强大和开放的局面，与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分不开，也可以说是它的积极后果。

研究魏晋南北朝史，民族关系是个重要问题，诸如内迁各族所建立政权的民族性质？各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性质？民族融合的规律等，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，它不仅关系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，也关系到中国史的全局。下面略述管见。

一、单一型民族政权和复合型的民族政权

我国历史上各族所建政权，大体上可分两类，一为单一型民族政权，如西汉时的匈奴，唐代的吐蕃等；一为复合型的民族政权，魏晋南北朝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大多属于这一类型。我们一般讲前赵是匈奴族政权，后赵是羯族政权，前秦是氐族政权，后秦是羌族政权，作为习惯称呼是可以的，但从政权的民族性质来说，就不确切了。要判断一个政权的民族性质，必须作出政权的民族结构、政策和政治措施的区分。一般来说各族在汉族地区所建立的政权，都不可能是